

## 我把掌声献给你

2012年6月的北京,我坐在人民大会堂里,亲历了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大会开幕式。会场中座无虚席,气氛热烈,满眼都是或白发苍苍或步履蹒跚的耆老。全体起立唱国歌时,前排座椅上一位瘦小而略显驼背的老院士在旁人的搀扶下颤颤而立。那一瞬间,我被他们感动了。从他们不再清亮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一种久远的圣洁之光。“神九”飞天、“蛟龙”下海,他们是这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引擎;追求真理、无私无畏,他们引导科技实力的强势增长;脚踏实地、心怀天下,他们点燃国民素质的燎原之火。从火车头到思想库,他们是这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推动着这个国家势不可挡的崛起与前行。

也许在庸常的日子里,他们和常人一样,也有着世俗

的纷争和欲望,可一旦走入科学的殿堂,理想主义的纯净令他们庄严而神圣。我把掌声献给了他们,我知道,这掌声也是献给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此刻,他们在实验室在教室、在珠峰在南极、在田间在城市,把心中的梦想付诸行动。

于是,有了我们,有了《人物周刊》。

我们不仅关注那些,对人类的进步和我们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同时也关注那些,在平凡的生活里彰显出人性向善力量的普通人。他们是科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企业家、艺术家,他们是民间英雄、公众领袖、人民代表、芸芸众生,他们参与变革,他们影响时代。而历史便是由一个个的人物传记书写而成。记录他们,便是记录历史;记录人物,便是为历史留存一份底稿。

■本报记者 郝俊

记者第一次见到石元春时,他刚刚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

在面对面采访他之前,记者以为这位耄耋老者在应对这场风波时多少会有些疲惫,但很意外,长达两三个小时的对话中,石院士始终平静从容。

2011年9月,举报“三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石元春学术造假事件引发各方关注。压力之下,石元春发表《事实与真相》一文对举报予以正面回应,并请求上级科教部门对其提供的事实和材料进行调查。

时隔数月,由科技部等5家单位组成的调查组对“举报”一事作出正式答复。调查报告指出:举报中所谓“石元春学术腐败第一贪”没有任何依据;网络炒作的“院士告院士学术腐败”的说法不成立,这是一次违背事实的炒作。

“我还是我”

回顾这场风波,石元春表情平静。

2011年8月,石元春在某网络论坛看到了这篇题为《中国学术腐败第一贪——揭露、控告原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三院院士”石元春的学术腐败》的实名举报文章。尽管这则网帖言辞激烈,但一开始他只觉得这是一场无聊的网络炒作,并未选择回应。

很快,网帖开始受到媒体关注。因实名举报人中,有同样年过八旬的中科院资深院士李季伦,此事被发酵为所谓“院士告院士”事件,引发社会各界持续议论。

被推至风口浪尖的石元春感到舆论压力如井喷般扩散开来。至此他才不得不打破沉默。

石元春随后在本报发表了8000字长文《事实与真相》,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我作为一个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培养成长起来的科学工作者,在农业科教战线上拼搏了半个多世纪,长期风餐露宿和在农村蹲点,至今一刻也未敢懈怠。现已耄耋之年,竟遭此不白之冤。我请求党组织和上级科教部门对我以上提供的事实和材料进行调查,还我以清白。”

文章见报那天,他带着一家老小兴致盎然地去颐和园赏桂。他相信“真金不怕火炼”,也因此更加坦然。

事情总算有了结论,对其中的波折,当事人不愿多谈。只是不少熟悉石元春的人常常关心他的身体,毕竟是80多岁的人了,他总是报之一笑:“我没事。”

“我还是我。”风波过后,石元春说自己的内心平静如初。

曲周往事

石元春是我国著名的土壤学家,他结缘土地的故事要从河北的一个小县城说起。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黄淮海平原因治水方针失误,土壤次生盐渍化大发展,盐碱地扩大了一倍。粮食产量大减,农民谈水色变,谈盐色变。

那时的石元春师从著名土壤学家李连捷先生,随着导师刚刚从待了4年的新疆盐碱滩上回来。他认为黄淮海平原的情况比新疆要复杂得多,必须把水盐运动规律摸清楚,才能对旱涝盐碱实行综合治理。

于是他给自己出了一个选题,只身一人,在北京大兴县芦城公社选了一片水盐运动观测场。

每月一次,他扛着取样工具和背包,从学校出发转乘好几趟公交车,再走上十几里路抵达取样点。回程时身上背着30多斤重的土壤标本。回校后他对采集的样本做室内化验,一做就是个把星期。就这样,一干就是3年,积累了大量宝贵资料。

在那个年代,石元春是土化系出了名的

## 石元春：静水流深

一种冲动,也自然就会为此献身。我说,知识分子能够先知先觉,因此要作用于社会发展,这就是求真和责任。有这「我后来关心生物物质的发展,有人说我功名成就,什么都不缺了,为什么还要去操心。」



“白专道路典型”。“文革”的第二年,红卫兵抄家时拿走了全部资料。留给石元春的除了无奈,只有拿不走的“水盐运动科学思想”。

几年后,这些思想有了用武之地。1973年6月,接到上级指示,北京农业大学要在河北省曲周县的“老碱地”建一个盐碱地改良试验点,石元春是挑头人。

受命第二天一早,石元春就搭上了赶往邯郸的火车。

曲周县,是当年邯郸地区盐碱地最为集中的地方,其北部张庄村一带被称为“千年不治的老碱窝”。石元春的眼前,农家徒四壁,麦子本该成熟的季节,农地里几乎荒芜一片,喝的水更是咸苦难咽。

这年秋天,石元春和他的同事们正式驻扎张庄村,开始盐碱地治理。

有之前的研究基础,他们很快就拿出了一整套初步治理方案,其核心是调控地下水。可是,当地的老乡却迟迟不肯配合上工。他们说,改碱的来了一拨又一拨,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地里被挖得千疮百孔,最后什么也没解决。

“我们这个老碱窝要是能治好,还用得着你们从北京来吗?”老乡们并不相信眼前这些白面书生。凭他们的经验,这些人不过是挖挖地,待几个月就走人了,不想再折腾。

张庄村的党支部书记赵斌是个直性子,他问石元春:“你们在这里到底能住多久?”

“改不好这块地,我就不走了。”石元春回答得干脆。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今晚我就召集支委会讨论。”赵斌拍着石元春的肩膀当即允诺。第二天,村里的老乡就跟着专家们轰轰烈烈地挖沟了。70岁高龄的李连捷,也跟着大家推起了土车。

第二年,麦种下地,原本寸土不生的地方,麦苗一棵棵长出来。周边的村民都跑来围观,连连说真是遇到了“高人”。曲周县志记载中,这块两千多年的盐碱地,愣是被这帮书生给治住了。

“这次立功的可不是我一人,而是一个实力很强的团队。花了不只3年,而是20年。”此后几年间,石元春和同事们继续驻扎在曲周,完善各项农业工程措施,提出了“半湿润季风区水盐运动理论”和监测预报技术,把治理经验推广到更多地区。

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与农业发展的成功,带动了我国黄土高原、三江平原、南方红黄壤等低产地区的治理,促进了全国性中低产地区农业开发,为缓解我国粮食短缺,1995年粮食总产超过5亿吨作出了重要贡献。黄淮海科技攻关项目获得了1993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石元春是第一获奖人。

后来每每忆起曲周往事,石元春都心绪难平。

“家里孩子托邻居照顾,我和老伴一年中有8个月都在地里,住着漏风漏雨的房子。我们付出生活和健康的代价是为了什么呢?”石元春说,各种奖励纷至沓来,但那是后来的事情,当时并不知道前面有“可以摘到的果子”。

现在想来,石元春觉得,这一切行为的驱动力,无非是因为“那些穷得要命,又跟我们好得要命,见面就要拥抱的农民”。自己有这方面知识,就想要做点事情,回报给他们。

农大校长“五子登科”

担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是石元春人生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受任之初,他倍感压力,农业高等教育一线的管理工作,就像治理盐碱地一样充满困难和挑战。他让遭受“文革”重挫、尚未恢复元气的农大,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在他的构想中,农大要建成小型的高端研究型大学,并提出研究生和本科生比例要大幅提升至1:1。“有人说我是痴人说梦。”石元春也知道,这个比例极端超前。

最严峻的现实是,当时的北京农大出现师资队伍断层,除了60岁左右的老教师,就是30岁以下的年轻教师,中坚力量微乎其微,教学质量自然下滑。

在一次工作会议上,石元春语出惊人,说要在任职期间从海外引进100名博士。可是,当时学校的住房条件之差,在北京高校中算得上“赫赫有名”,海归们望而却步。石元春一家四口,也是有8年时间挤在一间仓库房里。

眼看着许多优秀人才因为房子问题被兄弟院校“挖了墙脚”,石元春只能摇头,“房子就是人才啊”。

石元春找到学校总务处处长,让他准备一二十套房子,回国人才进校就能分配。这个事情在当时引起一场不小的震动,也引来了校内普通教师的不满。

“我跟着农大走南闯北,一大把年纪了还住在教室里。他们寸功未立,就能拿一套房子,你太偏心了!”一些老教师的质疑声传入耳。

“我不是居委会主任啊,我是大学校长。再过十几年,我们就要靠这批年轻人了。”石元春耐心地解释,只有这些办法才能吸引到优秀人才。

于是,人才真的来了,一批批年轻博士开始担任科研项目负责人,开展教学工作,如今已成为农大的中流砥柱。

为吸引并留住人才,石元春提出要“五子登科”:房子、妻子(安排工作)、孩子(安排小学托儿所)、位子和票子全到位。为了便于年轻教师的成长,学校在评定职称中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农大评出28岁的教授,一时引起轰动。就这样,石元春做了2年副校长、8年校长。

“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去”

卸任校长一职时,石元春给自己定了个“六字方针,三不政策”。他说,“六字”无外乎功过、是非、恩怨,要把这些过往忘记;“三不”,就是以后对学校的事情,不闻、不问、不说。

“我要另起炉灶,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去了。”石元春是性情中人,每一次角色的转换他都能很快适应,不论遇到怎样的环境,他也能泰然处之。

年过花甲,石元春开始潜心研究更为宏大的问题。

在2003年我国制订《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战略研究过程中,石元春担任农业组组长。其间,他偶然看到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9年发布的总统令《发展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

“像在一座封闭的房子里突然打开了一扇窗户。”石元春受到了强烈的启发。他说这是另一片与现代农业发展、国家能源转型、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向绿色文明过渡密切相关的广阔天地。

2011年,石元春著作《决胜生物质》面世。而在8年前第一次接触“生物质能源”这个新鲜事物时,72岁的他还完全是个门外汉。

“石老师,您都70多岁了,怎么开始‘不务正业’了呢?”有学生善意提醒石元春,还是别去“忧思”能源问题了,应该享受天伦之乐。

“我已经站在20年以后的道路上等着你们呐!要是你们什么都理解了,我还怎么当你们的老师?”石元春的玩笑中,亦有几分对未来的期许。

对于生物质,石元春说这就像恋人,理解得越深,越爱是她。在痴迷背后,则是他对农业现代化问题的深邃思考。

在石元春看来,我国传统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没有充分考虑农业自身的发展规律,使得农业附加值极低。他认为农业必须要形成自己独特的产业链,而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正是通往此路的广阔大门。

走进这扇门,石元春将其视为自己科学生涯的最后一站。他说路途充满艰难险阻,但是科学这个行当,从来就是要求真、要担责任,更要为此献身。

Card名片

石元春 1931年生,湖北武汉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著名土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49年考入清华大学农学院,后合并入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1956年该校土壤农业化学系研究生毕业。曾任1985年担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1987~1995年任校长。长期从事土壤地理、盐渍土发生和改良研究。近年关注生物质能源科技,著有《决胜生物质》一书。

## “人剑合一 莫出其右”

——对话石元春

■本报记者 郝俊

年逾80的石元春说他最近迷上了天才钢琴家李云迪。

“你看他,多么的气度非凡啊。”石元春毫不掩饰对偶像的溢美之词。有段时间,他把李云迪演奏的彩云追月下载保存到电脑上,每晚睡觉前都忍不住反复听好几遍。他四处搜集李云迪的资料和媒体采访,想要一窥偶像的精神世界。

李云迪说,钢琴已经与他的灵魂连为一体,石元春对此深感共鸣:“跟李云迪的钢琴一样,科学就是我的生命和全部。”

《中国科学报》:科学家和钢琴家,他们也有共通的精神气质吗?

石元春:他们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有共通的人生意境。在科学精神之内,是科学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它们已经化为我身体的一部分了。就像武艺高强的人,最高的境界就是“人剑合一”。

这也应当是科学家的最高意境,莫出其右。

《中国科学报》:不论是在曲周治理盐碱地,还是推动生物质科技,您对自己认准的事情总是全情投入。作为一名科学家,或是大学校长,您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石元春: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不论他是钢琴家、戏剧家还是科学工作者,其实都是在不断求真中进步的人。在曲周治理盐碱地,理解水盐运动,应该说只是很小的事情,但它背后有普适的科学价值追求,那就是求真。

当然,进入任何一个行当,刚开始可能只是为了糊口。一旦深入进去,就会痴迷,就会有求真的欲望和冲动。

从事科学事业,自然会受到知识的影响、熏陶和约束,知道事物发展要遵循规律。随之而来,就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去回报社会,这是不可逃避的责任。我后来关心生物质的发展,有人说我功名成就,什么都不缺了,为什么还要去操心。我说,知识分子能够先知先觉,

因此要作用于社会发展,这就是求真和责任。有这种冲动,也自然就会为此献身。

《中国科学报》:这种意境是否意味着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石元春:事实上,我对今天所呼吁和提倡的创新有不同看法。科学和技术本身就是创新,它是最终的结果和表现,并不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原始动力。这就好比是,你跟一个母亲说,你应当爱护孩子。可是,母爱是天生的,这种强调有些本末倒置。也就是说,没有创新就不是科学,因此没有必要把科学和创新分割开来。

还是那句话,科学的本质核心是塑造求真的冲动和责任感。科学工作者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应当追求“人剑合一”的境界。

另外,我们不能用一些泛化的概念和标签,去扼杀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中渗入大量经济和政治的因素,就会污染科学的纯洁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如果科学群体不再爱护、尊重知识,而是追逐物质利益,同样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Voice 见微

“上一届党代会,就有美国记者说‘你总有一天会移民美国’。我说,天底下也许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但唯独这件事情不会发生。我生1000次,都希望是在中国;死1000次,都是在‘中国’。”

——十八大代表、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11月11日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说。他还提到,自己不可能弃商从政,10年后就会退休。

“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常喜欢吹吹牛,说些假话,后来发现,说谎其实是一个劳动强度很大的工作。其对精力、脑力、勤奋度等的要求,几乎不下于‘老实做人’。”

——日本杉形大学研究生院讲师朱云飞评论加藤嘉一履历造假一事时说。

“转基因接受障碍是感情原因,不是理性原因。纯天然是幻觉,人类社会是建设来的,还会建设下去。人类从未因一项科学发现有风险就停止使用。更何况现代科学的风险控制达到了历史最高的水平。”

——11月7日下午举行的转基因媒体研修会上,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姜韬如是说。

“现在有一些建设者、决策者人文素质不高,重建是一种短期行为。恢复开封的历史盛况是不可能的,一切只能是幻想。”

——河南大学宋代研究所所长程民生在评价古都开封市计划投入千亿元人民币重造北宋汴京一事时说。

“一天上厕所,不准超过3次。”

——一位家长的自述文章《开学一月摧毁六年教育观》近日在网络引发共鸣。其中爆料称,学校对小朋友所有方面包括如厕次数等都要整齐划一,令家长非常担忧。

“本科教育是大学的关键。对大学来说,第一位的工作是教书育人,然后才是学术研究。特别好的研究型大学,可以强调教育和研究并重;但一般的大学应以教学为主,研究为辅。这个思路必须明确。目前,中国拼命发展研究生教育,在我看来属于‘超前消费’。”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我认为他更像是一名体制内的体制批评者。”

——诺奖委员会成员、瑞典文学院的彼得·恩隆德在评价莫言获奖一事时说。

“莫言获奖之后,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好多人问我的感受,这就像我哥娶了嫂子,洞房花烛夜,别人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祝他愉快。莫言能获奖,表明中国至少有10个人,也可以获奖。莫言获奖,很正常,如果是阎连科获奖,也很正常。”

——作家刘震云日前在回应媒体采访时说。

“一切都结束了,我现在不再想写任何东西……我已经将我拥有的天赋发挥到了极致。”

——现年79岁的菲利普·罗斯,美国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近日公布了自己的退休计划。罗斯的代表作有“美国三部曲”等,多年来一直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我在清华任教的时候,发现校园里很少有赵元任、陈寅恪、王国维等人的痕迹。当时我跑遍了清华园,注意到很少有学生注意到这些人跟清华的关系,也没有人真正在意。只有在谈到清华的历史时,这些人才被当做点缀被提及。”

——陈丹青近日在出席一个论坛时如是说。他还称,人才是一个国家的品牌,但在他接触的西方人眼里,中国被分割成两个时代,一个是古典中国,有许多为世界所熟知的人才名片;但现代中国“只有毛泽东一张”。

“对于大部分的中国青年而言,在高速增长、急速前进的中国,成功的公式仍然未变:刻苦学习、努力赚钱、成为‘房奴’、尽早结婚,最后生养子女。然后看着这个循环重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些目标难以实现,接受局外人的身份可能是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生活下去的办法。”

——《大西洋月刊》文章说。

(刘果摘编)